

第一章 元代喇嘛教

第一节 喇嘛教概述

一、成吉思汗时期

成吉思汗在长期征战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宗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的重大影响和势力。因此，他在每次征战中，特别是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十分注意利用宗教问题，以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成吉思汗发现西藏喇嘛教，并同它联系是在征服西夏王国的过程中发生的。

西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国家。所辖地区包括今天的宁夏和陕北，内蒙古西部地区和甘肃省东部地区。西夏王朝笃信喇嘛教，把喇嘛教崇奉为“国教”，聘请西藏喇嘛教僧人担任国师，参与朝政，因而，喇嘛教在西夏的影响很大。公元 1205 年至 1209 年间，成吉思汗曾三次领兵征讨西夏。第一次是 1205 年初次讨伐西夏，西夏主纯祐被迫称臣纳贡；第二次于 1206 年由于李安全夺取西夏王位断绝了与蒙古的纳贡关系，依服于金国，因此成吉思汗率兵征讨。1207 年李安全献女请和，恢复纳贡；第三次于 1209 年成吉思汗又领兵征讨西夏。蒙古军击败西夏五万大军，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市），李安全投降，称臣于蒙古。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过程中，了解到西藏地区的详细情况，并且同西藏地区的地方势力和喇嘛教发生过联系。

据藏、蒙、汉文史籍记载，于公元 1206 年（或 1207 年）左右，成吉思汗对卫藏地区采取过军事行动，并同喇嘛教发生联系。现将

其主要记载，归纳如下：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皇帝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饶迥火兔年（1207年）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你之治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部、南部三岗等地面全部呈献。皇帝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钦·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曾完成，一时未能迎成。我在此依止于你，请你在彼处护佑我。今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思藏之三所依（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故皇帝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大王。”^①

据《如意宝树史》记载于火兔年（1207年）博格多成吉思汗从卫地向藏地派遣使者同萨迦、昆都格、则莫宁博、贡嘎宁博建立施主与福因关系，并从卫藏地区请来“三宝”（佛、法、僧）在蒙古地方传播，使政教并行，如同日月光辉，欢乐的海洋般普照蒙古地方。^②

据《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岁次丙寅年四十五时征伐吐伯特之库鲁格多尔济合罕地。土伯特之合罕乃遣尼鲁呼诺延为首之三百人，贡献其众囊驼，会主与于柴达木之地，奏请愿降之意，则主上许之，大加赏赉其合罕及其使者而遣囊。上因致书仪于萨嘉。察克罗咱瓦·阿难达·噶尔贝喇嘛曰：“兹遣还尼鲁呼诺延也，当即请汝，但为我世事尚未完竣，故未请耳。我且于此奉汝（教），汝其在彼‘佑我乎！’由是收服格里三部以下三地八十万里土伯特之

洛桑泽培著《蒙古佛教史》（《显明佛教之宝灯》）双译本 9 页。

② 益希班觉著《如意宝树史》（蒙译本 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本书《年表》中又记载于火虎年（1206年）成吉思汗向卫藏地区进攻，统辖了除“密纳克”（西夏）以外的全部卫藏地方。

众矣。’^①

据《蒙古汗统黄史》记载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出征吐蕃之贡噶多尔吉可汗。吐蕃可汗闻讯遣伊拉古诺颜等众使者谓曰：‘伏愿纳贡请降，’使者来至柴达木迎接。成吉思汗嘉许之，大赉施舍毕，复以伊拉古诺颜为使，致书献礼于萨迦·察克罗咱瓦·阿难达·噶尔贝喇嘛。书云：‘本欲聘汝然世事尚未完竣故未聘请。谨遥申皈依之诚，仰肯护佑之力。’”

据《蒙藏佛教史》记载：“西藏自朗达尔玛之后国内分崩无统一之主，彼此内争，其时萨迦派后裔，累世为西藏国师。及元太祖成吉思汗掘起蒙古、西攻西藏，其王克鲁克多尔济请降。时随征军官返蒙之际，盛称萨迦派喇嘛在西藏势力。太祖因致书于萨迦派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喇嘛遥申皈依特聘之至蒙。”蒙古太祖成吉思汗，礼聘西藏萨迦派喇嘛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宣扬佛法。’^③

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最宏传者为萨迦派方转轮大王成吉思汗兵威及藏地遂统一阿里三围卫藏四部多康三冈遣使入藏原贖萨勤庆喜藏缔结施供之缘尔后又来召迎彼至蒙古曾请得佛像经塔而去仗此之故蒙人乃敬信佛法供养三宝亦曾受持勒策等戒，是为佛法传入之嚆矢。’^④

据《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记载成吉思汗于藏历第三饶迥火虎年（公元1206年）进兵卫藏地区，当时卫藏阿里各地的首领都无力抵御，请求归顺。萨迦派的喇嘛首先与蒙古联系，从卫藏把许多佛像和经典，带到蒙古地区，这是佛教传入蒙古的开始。^⑤

①《蒙古源流》（新译校注卷二，157页。

《蒙古汗统黄史》（蒙文）

《蒙藏佛教史》第二篇。

土观《宗教流派镜史》第四章第一节，218页。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137页。

又载：“藏历第四饶迥火猪年（公元 1227 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之后，向西夏国王的喇嘛藏巴东库哇·旺秋扎西问法，宣布了免除西藏地方僧人的差税和征兵役的诏书（即：《优礼僧人诏》）授予佛教僧人重大特权。”^①

另外在《青史》、《新红史》、《新元史》、《多桑蒙古史》、《水晶鉴》、《黄金史》、《金鬘》、《安多政教史》、《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等诸多藏、蒙、汉文史料中，都有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过的记载。

但是，以上史籍记载中，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接触的时间、地点和具体人物，有不同的说法，相互矛盾，有的是明显错误。因此，对这一历史事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例如，有些史料中所说的阿难达·噶尔贝喇嘛是指萨迦派喇嘛教第一代祖师贡嘎宁博。但据考证，贡嘎宁博和成吉思汗不是同一时代人。因此，按年代计算，如果成吉思汗同萨迦派首领联系过的话，只能是萨迦派第三代祖师扎巴坚赞。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的注释中，就成吉思汗接触的具体人物作了考证，指出了错误。^②

以上资料，虽然对事实经过的记载有些出入，但共同点是，当时成吉思汗同西藏喇嘛教萨迦派（或噶举派）教主发生过联系，根据当时情况来看，主要是建立关系，图谋后计，并未邀请他到蒙古来传教，该喇嘛也没有应邀前来。萨迦派教主到蒙古来的史实，是成吉思汗后代的事情了。

以上是喇嘛教同蒙古发生联系的最初记载，当然这种联系，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并非为了信仰。

^①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38 页。

^②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38 页注释。据洛桑赤列先生考证，在《如意宝树史》、《新红史》中记载：当时成吉思汗联系的西藏喇嘛教人物，贡嘎宁博（1092—1158）和蔡巴·贡噶多吉（1309—1353），都不是与成吉思汗（1162—1227）同一时期的人物。前者是成吉思汗以前的人，后者是成吉思汗之后的人。

二、窝阔台汗时期

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太宗次子库腾汗（阔端）同喇嘛教正式发生过联系。据《蒙古源流》记载：“斡歌台合罕……年四十二岁即合罕位，欲请萨迦·托克巴·嘉木灿而耽延。逾六年，岁次癸巳，年四十七岁崩。其子古余克，库坦（即阔端）二人也。……库坦丙寅年生，岁次甲午，年二十九岁即合罕位。岁次乙未，因患龙君作祟之症，无人能治愈。共议：‘闻西土蒙克地方，有一全备五蕴，大有灵验之萨斯嘉·恭噶·扎勒灿云，若请彼来，庶有救乎！’送遣书玛古特之道尔达达尔罕为首之使者请焉。”^①

据《续藏史鉴》记载，公元 1239 年至 1240 年间，太宗次子库腾汗派大将道尔达·达尔汗统兵征服了整个西藏：“东至工布、西至尼泊尔，南至门达旺，削平诸酋寨，莫不臣服”。有些藏文史料记载：道尔达·达尔罕在这次征服中，焚烧了西藏著名古寺——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喇嘛五百多人。但是对其他寺庙和喇嘛都没有进行破坏和杀戮。这可能是当时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喇嘛，反抗蒙古军的缘故。又据《续藏史鉴》记载：这次军事行动胜利后，道尔达·达尔罕写信向库腾汗报告军事和西藏社会情况时说：“现今藏土惟噶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达隆巴噶举派、法王最有德行，直贡巴·直贡噶举派、京俄大师具有法力，萨迦班智达·萨迦派教主，学富五明（佛教用语，意为学问，五明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明、工巧明），请我主设法迎接之。”从这里看出，道尔达·达尔罕对西藏喇嘛教并非采取敌视态度，而是采取了支持和保护政策。库腾汗采纳了道尔达·达尔罕的意见，于 1244 年派遣以道尔达·达尔罕（此人于 1240 年末奉命率军返回甘肃）为首的使臣，携带诏书，前往西藏邀请萨

^① 《蒙古源流》（新译校注 卷四，190—191 页）。

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弟达·萨斯加娃 萨班·贡噶坚赞 到凉州来和他会面。据《萨迦世系史》记载 库腾汗致萨迦·班弟达的邀请诏书全文是：

“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理，皇帝圣旨，晓谕萨迦班弟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个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 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 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而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 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 汝岂不惧乎 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四方众僧。”

“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六升，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 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缎二匹 正幅彩缎二匹 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来送。”

“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蒙古的使臣携带诏书已经前来。这一诏书，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萨班若以年迈为由推辞 卫藏地区必定受到“伤害众生。”因此，无可推辞的情况下，萨迦班弟达·萨斯加娃不顾年迈的身体，于 1244 年 当时以 63 岁高龄携带两个侄子八思巴（11 岁）和恰那多吉（7 岁）从萨迦动身一经过拉萨 于 1246 年 8 月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此时，库腾汗去和林参加贵由汗即位大典。故于 1247 年库腾汗回到凉州会见萨迦班弟达。他们，拟定了西藏地区归顺蒙古大汗的条件，以及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等。同时萨迦班弟达还两次致书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权首领，劝说他们诚心归顺蒙古大汗，如要违犯，必将招致灭亡。这对当时西藏归顺元朝，统一国家大业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库腾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专门给修建了一座幼化寺，供其居住，并授予萨迦·班弟达·萨斯加娃 管

理西藏政教大权 有的史料记载 曾授予‘国师’尊号 该喇嘛在凉州住了 7 年 于 1251 年 10 月 14 日 圆寂于该地。萨迦班弟达之后 八思巴兄弟继续居留在凉州。

这一段历史 在很多历史文献中 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如《达赖喇嘛传》记载：“阔端乃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地方传教。当时萨迦班智达业已六十三岁 携其侄子八思巴 当时十一岁 与另一侄子恰那多吉 当时仅七岁 于 1244 年前往凉州 今甘肃武威 觐见阔端 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蒙古大汗的条件 以及缴纳贡赋的品种和数量。”^①

据《蒙古源流》记载：“彼萨斯嘉·班弟达者 系目前戊子纪年以来三千三百七十五年 岁次壬寅降生 岁次午辰 年二十七岁时赴印度 与异端之六师辩难论驳。获班弟达之号归来后 乃叔扎克巴·扎勒灿者 曾预言告之曰：‘此后有一时 自东方来 冠若栖鹰 靴以猪鼻 房如木纲 凡三四语后 每发‘额其格因’之音者 一乃蒙古国主 菩提萨都瓦之化身 库坦合罕 遣道尔达使者来请汝。届时汝必往 则汝之教义在彼大兴焉云’。遂付：‘师命所已验矣’。岁次甲辰 年六十三岁时首途 岁次丁未 年六十六岁时 谒见合罕 遂塑狮吼观世音菩萨像 收伏龙君 并授合罕以该项灌顶之作佛事之故 合罕之病即时痊愈 从皆欢喜焉。”此后 一遵萨斯嘉·班弟达之旨 首兴宗教于边远之蒙古地方。岁次辛亥 萨斯嘉·班弟达年七十岁时 得涅槃之道。库坦合罕在位十八年 亦于此辛亥年崩。享年四十六岁。喇嘛与施主合罕二人 同年逝于膜拜之地云。”^② 据《蒙古汗统黄史》记载：“库腾汗……患龙君病 无人能治愈 众议云 西方长生之地有一萨迦贡噶坚赞者 系精通五明之圣

^① 《达赖喇嘛传》7 页。

^② 《蒙古源流》（新译校注 卷四，191 页）。

喇嘛也，彼能医治汗疾，遂遣使往迎。萨迦·班弟达者……年二十七岁赴印度，制胜异端之六师之辩难，获班弟达号而归。其伯父扎巴坚赞者曾经预言：‘此后特有一日，东方之蒙古国，帽若栖鹰，靴以猪鼻，屋类木纲，每发三四语后，额其格因之者，蒙古国主菩萨之化身，名曰库腾可汗，彼将请汝，汝必往行，汝之禅教特大兴于彼处，因谓：‘适奉其事也。’年之六十三，辰年起程，六十六岁，未年会见可汗，遂塑狮吼观世音菩萨像，收伏龙君，为其灌顶，可汗痊愈，众皆欢喜，即遵萨迦·班弟达之命而行，禅教遂初兴边陲蒙古之地。萨迦·班弟达年七十岁，辛亥年圆寂。’^①《蒙古源流》、《蒙古汗统黄史》记载的这两段故事，既有历史事实，又有宗教神话与民间传说，很有趣地叙述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

据《红史》记载：“皇子阔端由北方，即凉州派人前来迎请他（萨迦班弟达·贡噶坚赞）以前，述尊扎巴坚赞曾预言过：‘以后由北方来一与我们语言族属不同，头戴飞鹰似的帽子，脚穿猪鼻靴的人前来迎请，如应邀前去，对佛教大有利益。’依照这一预言，贡噶坚赞于六十三岁的阳木龙年，伯侄三人前去，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到达凉州。此时皇子阔端前去参加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去了，回来时在羊年与萨迦班弟达会见。班弟达获得了祭天大典的首席长老的地位，弘扬佛法，此上师享年七十岁，于阳铁猪年逝于凉州。”

据《宗教流派镜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孙贵由与阔端于凉州为王时，阔端闻萨班盛名，遣使入藏迎师至蒙古，先是名称曾为萨班，悬记云：‘尔后有戴鹰帽冠，着象鼻靴之边鄙人来迎时，汝应即去彼处，能宏扬佛法，饶益众生。’果应此记，遂允前往，其侄八思巴与卡那随侍，于胜生第四丙辰年，而谒阔端大王。时王有病，萨班为修狮子吼法，因而痊愈，王之上下，皆大欢喜。传喜金刚灌顶，又示现

^① 《蒙古汗统黄史》卷三。

^② 《红史》43页。

种神灵异 使生净信。”此前蒙古尚无文字 萨班志欲创造新字，一日见一妇人手持揉皮树枝，状为锯齿，乃方其形而造蒙字，其字母为阿、埃、伊、那、内、尼、洒、腮、斯、巴、贝、比、哈、格、克、嘎、给、克；马、美、米；拉、雷、里；然、惹、日；阿、儿、耶、达、呆、笛；它、台、梯；杂、则、孜、楂、才、此、亚、业、益、瓦、歪、未等。以阴阳、三性或刚、柔和三声统一而订读法。”丁亥年 王及萨班俱逝 闻萨班灵骨藏于凉州城外化部 幼化 寿宝塔之内云。”

据《汉藏史集》记载于 1244 年“蒙古之王额沁阔端派遣金字使臣多尔塔赤前来迎接他。上师心想：‘以前在察看我的业缘时，伯父大尊胜者扎巴坚赞曾预言说：‘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将有这样的邀请者从北方来，那时你不要疑惑，应当前去，对教法和众生都大有利益。你应当前往。’于是他委派伍由巴大师索南僧格和夏尔巴喜饶迥乃为曲本，负责教法方面的事务，又委派仲巴·释迦桑布为内务总管。上师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二人虽然年幼，也作为随从带领前往。上师一行在路上走了三年，于马年（公元 1246 年）到达凉州。此时汗王已去参加贵由汗即位典礼。到阴火羊年（公元 1247 年），施主与福田双方会见，上师成为汗王祭天的首席长老。萨迦班智达成为汗王的上师，在蒙古地方宏扬佛法，这是蒙古与萨迦派最早建立的关系。萨迦班智达护持法座三十五年 于七十岁阴铁猪年（公元 1251 年）11 月 14 日在诸种奇兆伴随下在凉州幼华寺逝世。”^②

以上记载，记述的故事情节，虽有宗教传说性质，但时间、地点、历史事件大致相同。

库腾汗是较早接触青、藏地方的人，因此，必然同喇嘛教接触，进行过联系和建立关系。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主要是政治联系，便

土观：《宗教源流派镜史》第四章第一节 219 页。

② 《汉藏史集》202 页。

于对青、藏地方的统治，并非如有的史书所说的，建立宗教信仰关系。当然喇嘛教利用这一机会传播其教，是完全可能的事。由于西藏地区喇嘛教中派别很多，其中主要的派别有：噶当派（教诫派，该派后来与宗喀巴的格鲁派合并）萨迦派（俗称花教）噶举派（俗称白教），宁玛派（俗称红教）当时噶举派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信徒中的影响也很深，而且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属于统治西藏的主要势力之一。但是，当时库腾汗没有邀请其“丛林最多”的噶当派和有“具大法力”的噶举派法王，却邀请了“学富五明”的萨迦派一班智达。其原因可能是：其一，为了遵顺成吉思汗的先例；其二，萨迦派为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始终依附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政治势力。

三、蒙哥时期

蒙哥当政时期（1251—1259）对宗教也采取了优礼政策。他在继承蒙古大汗位之初，向全国发布的继位诏书中明确宣布：对各类宗教采取免除“兵役、劳役、贡赋”等优礼政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哥追认成吉思汗、窝阔台两代豁免基督教、伊斯兰教、偶像教教师赋税之诏敕。”^① 1252年2月八思巴在致西藏喇嘛教头领们的信中记载：“蒙哥汗继位之诏书，已向各方宣布，境内各处平安。尤其是向各地方宣布了‘对僧人免除兵役、劳役、贡赋，使臣们不得在僧舍住宿，不得向僧人摊派乌拉。使僧人们依照教法为朕告天祝祷，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之良善诏书。皇帝并宣谕我：‘已派金字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定地界，汝可遣僧人同往’。为此我已派遣格西多吉周与格西松布等率领随从前往，详

^①《多桑蒙古史》254页。

细情况可询问彼等。”^① 从这一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蒙哥继位初，对宗教人士和对西藏采取的政策：即对宗教人士采取了免除“兵役、劳役、贡赋”等各种优礼政策。对西藏喇嘛教继承阔端的政策，仍由萨迦派统领。对西藏地区派遣金字使者，开始清查户口，划定地界，而且命八思巴派遣僧人协助。

蒙哥当政时期，同各类宗教界人士，有广泛地的接触。据《多桑蒙古史》记载：“鲁不鲁克留居帝廷之时，曾见蒙哥及皇族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除蓄养珊蛮或巫师外，兼瞻养此三教之教师。”“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谨守成吉思汗遗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同等，无所偏袒。”^② 据史料记载，蒙哥在哈拉和林，经常召开盛大集会，让各类宗教界人士进行辩论。1254年5月30日，召开盛大集会，让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进行辩论。据说“当时受到攻击者，只有佛教”。但是，时隔不久，情况又变了。1226年蒙哥专门召开一次佛教大会，以鼓励和支持佛教。1258年蒙哥命忽必烈在上都主持召开一次道教和佛教（包括喇嘛教）的辩论大会。这次辩论大会，是应佛教（喇嘛教）僧侣要求而召开的。这次大会是决定道教和佛教胜负的关键性大会。因此，大会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而且蒙哥和忽必烈极为重视。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道教道士和汉佛教高僧外，还有克什米尔高僧那摩，西藏高僧八思巴，而且这两个人，在辩论中冲锋陷阵，为佛教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这次大会情况，元朝僧人祥迈写道：“今上皇帝建城上都，为国东藩，皇帝圣旨，倚付将来，今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僧道两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事意，普召释道两宗，少林长老，为头众和尚，每，张真人，为头众先生，每，就上都官中大阁之下座，前对

《萨迦五祖全集》汉文引自《蒙藏民族关系史略》22页。

《多桑蒙古史》264页。

论。内众即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国师、西番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汉地中都圆福超长老、奉福享长老、平滦路开觉迈长老、大名津长老、塔必小大师、提点素摩室利、译言真定蒙古歹、北京询讲主、大名珪讲主、中都寿僧录，资福朗讲主，龙门育讲主、太保聪公等三百余僧，儒士窦汉卿、姚公茂等，丞相孟速思、廉平章丞相木华犁、张宗谦等二百余人共为证。道士张真人 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英，道判魏志阳，讲师周立志等二百余人共僧抗论。’^① 这次大会，以佛教的胜利和道教的失败而告终。道教的樊志英等十七人按约受罚，在龙觉寺削发为僧，焚烧道教四十五部经，收归以前被道教占据的佛寺 237 座。

从上述记载看，这次大辩论是佛教和儒家联盟对道教的斗争。辩论的背景不仅是宗教的矛盾，也是政治、文化的冲突，此次辩论实际上是在蒙哥和忽必烈支持佛教的背景下展开的。因为，蒙哥和忽必烈等人特别厌恶道教的“化胡成佛”之说。因此辩论一开始，道教就处于被动状况，直至最后失败。辩论中，那摩和八思巴发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八思巴高度发挥了佛教的论理学说，驳倒了道教的很多论点，对佛教的取胜，道教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赢得了忽必烈的更加信任和尊敬，大大提高了他个人的威望。同时也提高了佛教喇嘛教的地位。

这次大会，由于佛教完全胜利，成为佛教史上重要历史意义的一页。从此，佛教在元朝宫廷中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次道教的失败，实际上只是邱处机的全真派道教的失败。大辩论结束之后，蒙哥和忽必烈主张张宗演（天师）的正一派道教代替全真派道教。

经过此次大会，蒙哥在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喇嘛教）了。据《新元史》记载：“蒙哥元年辛亥 1251 年 夏六

^① 《大元至元辨伪录》卷四。

月，帝继位于斡难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命僧海云，掌释教事，道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冬，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①“铁哥……迦叶弥儿者，……必斡脱赤与叔父那摩具学屠法。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盖往归之，乃皆人见，太宗礼于之。定宗师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②

与此同时，蒙哥同康、青地区的噶举派喇嘛教发生密切联系，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很高的待遇。传说：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噶玛拔希（却吉喇嘛）是“深习密法，显有神通”的人物。早期传教于康、青、甘藏族地区，使该派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该派颇有影响的人物。1252年忽必烈在领兵南下途中，经过四川西北部地区时，听到噶玛拔希的盛名。因为忽必烈已经注意到西藏喇嘛教中，派别很多，除已经建立联系的萨迦派外，噶举派也是影响很大的教派。因此，当时忽必烈可能想要“兼容并蓄”利用这些教派的影响，为蒙古王朝统治西藏服务。约于1252年冬或1253年春，派使臣邀请噶玛拔希前来相会。噶玛拔希应邀前来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详细询问了青、康、甘地区藏族情况和噶举派喇嘛教的情况。忽必烈对会见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噶玛拔希留在身边。据《红史》记载：“初，他居于多康地方时，忽必烈带上在绒波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噶玛拔希，他使忽必烈发菩提心，见到诺桑和龙树等很多菩萨。忽必烈听到噶玛拔希当时的名声以及看到将来成为大成就者的各种征兆，又派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噶玛拔希，当噶玛拔希是否前往而犹豫不决之时，龙王和密主显现说：‘为利益众生，还是前去为妥。’因此决定前往。”^③忽必烈是最初邀请他的人，而且是恳切要求他留在身

《新元史》卷六 宪宗本纪。

《元史》卷一二五，3075页 铁吾传。

③ 《红史》80页。

边。但是噶玛拔希婉绝了忽必烈的要求，他未同意忽必烈的挽留而离去。这可能成为后来忽必烈继位后，噶玛拔希的不幸遭遇的祸缘。

噶玛拔希离开忽必烈后，北上到今甘肃、宁夏等地传教。据说，在这些地方兴建和修复了许多寺庙、佛塔，因而名声大振。1256年噶玛拔希“受念青塘拉山神和十二护法神之迎请，准备到后藏地方云游”时，蒙哥听到他的盛名，派金字使臣前来邀请他到蒙古国首都哈拉和林。于是噶玛拔希放弃返回西藏的念头，便到了哈拉和林会见蒙哥汗。据《红史》记载：“……蒙古大汗蒙哥听到仁波且（即噶玛拔希）之名声后，派出许多金字使者前来邀请，他见到益喜巴和那拉噶波等世间各种神祇之神幼，动身去蒙古……。”

噶玛拔希到哈拉和林后，谨见蒙哥汗，主持了为王室成员、贵族举行的密宗灌顶仪式，“并使全体国王、百姓每月都守护，分别解脱三时戒，发菩提心，他讲解四身灌顶，使蒙古王产生善体验。”噶玛拔希在哈拉和林，主持宫廷宗教活动，向王室、贵族讲解喇嘛教教义、教规，并主持修建喇嘛教寺庙。因而，在哈拉和林王室宫廷中备受尊敬，“他的名声如遍布天空的星星，被汗王奉为顶饰。”^③蒙哥汗赐予他噶玛拔希（即上师）尊号，发给金印一方和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因此，噶玛拔希传下来的转世系统，称之为噶玛噶举黑帽系。据《红史》记载：“汗王并赐噶玛拔希金印和一千锭银子等无数财宝，全体应供喇嘛都很高兴，并三次大赦一切囚犯，他在哈拉和林地方修建大的寺庙……。”^④从此，更加提高了他的地

① 《红史》：81页。

② 《红史》：81页。

③ 《红史》：81页。

④ 《红史》：81页。

位和影响，在西藏喇嘛教和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拔希”这一尊称，是同后来元朝“帝师”等级相差不多，是地位很高的封号。这就是黑帽系名称的来由。

宪宗蒙哥时期，西藏喇嘛在蒙古地方已经开始活动，而且在宫廷中受到礼遇，有较高地位。据史料记载：“当蒙哥可汗时代，在蒙古大都和林，遇着红色僧袍之契丹僧，在庆典节日，同他并座。”又据《蒙古史略》记载，蒙哥曾向卢布鲁克说：“这些宗教犹如一手之五指，可是又向佛教徒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他不过利用这些宗教，达到他的政治目的。”^①蒙哥又委任达摩为“国师”，掌管佛教。上述史料记载说明，蒙哥对待佛教（包括喇嘛教）确实比其它宗教优厚。因此，有些史料认为的，喇嘛教传入蒙古是在蒙哥时代，兴盛发展是在忽必烈时代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这一时期，从多方面史料证明，蒙哥还没有完全放弃成吉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对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等，基本上采取不过分偏向的政策。蒙哥每到蒙古族的盛大节日，由他召集庆祝时，还专门让各类宗教为他祝福。在有些大的宗教节庆，他还接受宗教教士为他祝寿。蒙哥为了表示对宗教的尊敬，“下令国内凡逢每月四吉辰，任何人不准欺凌别人，不准杀生吃肉，不危害众告天下，使其护持各自教法。”^②《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大开朝会，届时基督教师盛服先至，为汗祝寿，并以其盞祝福。彼等行后，回教师继之，所谓也同。事后偶像教徒继之，所谓亦同。”^③马可波罗是基督教教徒，因此，他的记载极注意基督

^① 《蒙古史略》48页。

卢布鲁克：法国传教士，1253年奉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他曾到过当时蒙古首都哈拉和林，谒见过宪宗蒙哥大汗，1254年携带蒙哥汗书信，返回法兰西复命。著有《卢布鲁克行记》一书，介绍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宗教情况。

^② 《元史》81页。

《马可波罗游记》308页。

教之事，并极为推崇。其实根据上述各类史料记载分析：蒙哥执政后期可以肯定他确有偏向于佛教喇嘛教的情况，其原因同他当时的政治目的和军事行动有直接关系。因为他的军事目标，主要是推翻南宋统治，占领中原地区、西南大理和西藏地区。因此，必须重视在这些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喇嘛教），通过利用这些宗教，为其军事和政治目的服务。

四、忽必烈时期

蒙哥汗即位（公元 1251 年）后，派其弟忽必烈进军川滇，包围南宋。公元 1252 年忽必烈从六盘山率军南下，1253 年灭大理，建合刺章行省（即云南行省）建都押赤（今云南省昆明市）。1254 年招降“吐番”诸部，在河州等地设置“吐番”宣慰司、都元帅府，控制了西藏及整个西南地区。忽必烈在招降“吐番”诸部过程中，仿效前例，利用西藏喇嘛教，达到其巩固与稳定对“吐番”地区统治的目的。

1251 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派遣使者前往凉州，邀请萨迦班弟达·萨斯加娃前来商讨西藏大计。当时萨迦班弟达已年迈多病辞谢，而派其侄八思巴随同阔端之子一蒙哥都去六盘山会见忽必烈。据说，当时忽必烈见到八思巴后，由于八思巴年轻、谦虚、聪慧、诚实而深受忽必烈宠爱，故将八思巴留在身边。“八思巴给忽必烈汗受灌顶，由此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①据《汉藏史集》记载：“当萨迦·班弟达伯侄到达凉州以后，蒙古薛禅王传令‘听说有殊胜的萨迦喇嘛到了凉州，他应该当我供养的上师喇嘛。萨迦·班弟达因年老未去，上师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守凉州的阔端之子）前去汉地，与驻在六盘山的薛禅王忽必烈会

^①《红史》43 页。

见。薛禅王大喜，给了凉州一百名蒙古骑兵，留下八思巴，结成施主与福田关系。”^① 但不久因萨迦·班弟达病重，八思巴离开忽必烈返回凉州。^② 萨迦·班弟达于同年 11 月 14 日在凉州去逝。

1252 年忽必烈从六盘山率军南下，约于 1252 年冬或 1253 年初，进军到四川北部地区，他派使臣邀请噶玛拔希前来相见，以商讨西藏大计，噶玛拔希前来会见后，又不顾忽必烈的挽留，竟离他而去。（关于忽必烈同噶玛拔希的关系，本节前段和本章第三节已作详细叙述）

1252 年 8 月，八思巴在凉州为萨迦·班弟达的灵塔举行开光仪式后，准备返回萨迦，欲从萨迦·班弟达弟子伍由巴受比丘戒。于是八思巴离开凉州，前往朵甘思（即今四川西部藏族地区）。1253 年，忽必烈攻取云南大理后，奉蒙哥之命，北返回朝。此时，八思巴在朵甘思获悉伍由巴已经去逝，便改变了自己返藏计划，而与忽必烈会合，住在一个名叫忒刺的地方。^③ 以后，八思巴跟随忽必烈北返。1255 年八思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从高僧扎巴僧格受比丘戒。1257 年八思巴到五台山。1258 年八思巴随忽必烈到开平府（上都），^④ 同年在开平府参加了第二次佛、道二教举行的辩论大会，并取得了胜利。

《汉藏史集》 203 页。

关于忽必烈在六盘山召见八思巴的时间，有关史料记载不一。《蒙藏民族关系史略》载：1252 年；《红史》、《达赖喇嘛传》载：1253 年。据《萨迦世系史续编》总纲注释第四条的说法是：八思巴于 1251 年夏，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备受宠爱，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后，继为萨迦教主。次年八月，为伯父灵塔举行开光后，离开凉州取道朵甘思返萨迦。途中再次谒见忽必烈，表示效忠。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宗灌顶。1252 年，忽必烈赐给“优礼僧人诏”，确保后藏萨迦寺僧众不受侵害。次年返藏准备受比丘戒，途中到河州（今甘肃临夏），从高僧扎巴僧格受比丘戒后，折回上都。

③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26 页。

④ 《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28 页。